

魯迅在廣州



毛主席语录

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

说 明

一、《鲁迅生平资料丛抄》是为中文系学生编写的一套教学参考书，包括《鲁迅在绍兴》《鲁迅在日本》《鲁迅在北京》《鲁迅在厦门》《鲁迅在广州》《鲁迅在上海》，将分辑编印出书。

二、《鲁迅在广州》参考并采用了中山大学中文系所编《鲁迅在广州》一书的材料，丁景唐、张能耿等同志应邀为本书撰稿，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三、这一辑由薛绥之孙进增同志编校。水平和条件所限，错误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七七年七月

目 录

鲁迅关于在广州时期的自述·····	(1)
鲁迅与广州的工农革命运动·····	张能耿 (24)
鲁迅在广州大事表·····	江 立 (34)
鲁迅在广州期间著译编目·····	(41)
新发现的鲁迅佚文的一个问题·····	静 闻 (47)
厦门和广州·····	许广平 (58)
回忆鲁迅在广州的时候·····	许广平 (68)
鲁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	景 宋 (74)
北新书屋·····	景 宋 (76)
关于开设“北新分局”的事情·····	静 闻 (78)
广州同住·····	许寿裳 (84)
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	伏 园 (87)
欢迎了鲁迅以后·····	坚 如 (90)
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	徐文雅 (93)
一个共产党员眼中的鲁迅先生·····	韩托夫 (103)
第三样世界的创造·····	—— 声
——我们所应当欢迎的鲁迅·····	(107)
值得怀念的地方·····	伍 木 (111)

回忆鲁迅在广州·····	宋云彬	(113)
忆鲁迅先生在中大二三事·····	沈鹏飞	(120)
鲁迅在广州的生活点滴·····	何春才	(122)
我忆念到鲁迅先生·····	清 水	(126)
友谊的选择·····	唐 骏	(132)

——读鲁迅给山上正义的信

关于《阿Q正传》日译者山上正义回忆鲁迅在广州的一些补充说明·····	丁景唐说明	吴元坎译文	(140)
关于鲁迅与创造社联合发表的反帝宣言·····	李 江		(147)
欢迎鲁迅先生来广州·····	张廷庐		(150)
可记的旧事·····	户 一		(152)
两次访钟楼记·····	黎锦明		(163)
这时节·····	有 恒		(169)
鲁迅先生往哪里躲·····	宋云彬		(174)
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	徐丹甫		(178)
走到出版界。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摘录)·····	长 虹		(183)
鲁迅与广州的几种刊物			
关于《人民周刊》·····			(186)
本刊宣言·····			(188)
关于《少年先锋》·····			(189)
寄元暎(代发刊词)·····			(192)
我们的启事·····			(194)
《少年先锋》为谁办的?(通信)·····			(195)

关于《做什么?》	(197)
我们应该做什么?(发刊词)	(199)
关于《支部生活》	(200)
附:关于《这样做》	(201)
有关鲁迅在广州的报导	
本校增聘名教授及整理医科附属医院	(203)
世界语同志欢迎步行全球世界语学者纪盛(摘录)	(204)
本校各科系主任业已聘定	(205)
本校举行开学典礼纪盛	(206)
本校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	(208)
本校派教授任社会科学研究会指导员	(209)
鲁迅在中山大学所开课程	(210)
纪念总理二周年之宣传方法	(211)
南中国文学会之组织	(212)
纪念黄花节的经过情形	(213)
组织委员会已成立	(215)
挽留周树人教授	(215)
文史科为缺课问题重要布告	(216)
新文学巨子鲁迅先生之公开演讲	(217)
市夏令学术讲演题录	(218)
附录:有关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的报导	(220)

鲁迅关于在广州时期的自述

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

《两地书·六九》（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

这里（按，指广州）很繁盛，饮食倒极便当；在他处，听得人说如何如何，追来一看，还是旧的，不过有许多工会而已，并不怎样特别。但民情，却比别处活泼得多。

《致韦素园》（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六日）

中大定于三月二日开学，里面的情形，非常曲折，真是一言难尽，不说也罢。我是来教书的，不意套上了文学系（非科）主任兼教务主任，不但睡觉，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想设法脱卸这些，专门做教员，不知道将来（开学后）可能够。但即使做教员，也不过是五日京兆，坐在革命的摇篮之上，随时可以滚出的。不过我以为教书可比办事务经久些，近来实也跑得吃力了。

.....

我在这里，被抬得太高，苦极。作文演说的债，欠了许多。阴历正月三日从毓秀山跳下，跌伤了，躺了几天。十七日到香港去演说，被英国人禁止在报上掲載了。真是钉子之多，不胜枚举。

我想不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

《致章廷谦》（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但我初到广州的时候，有时确也感到一点小康。前几年在北方，常常看见迫压党人，看见捕杀青年，到那里可都看不见了。后来才悟到这不过是“奉旨革命”的现象，然而在梦中时是委实有些舒服的。

《三闲集·在钟楼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

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

《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

至于我说无甚可以攻击之处的话，那可的确是虚言。其实是，那时我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我

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
荒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
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
别处都差不多的。

《三闲集·在钟楼上》（一九二七年
十二月）

到后来，却有些改变了，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然而有
什么用呢？在一处演讲时，我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
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
当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给一处
做文章时，我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
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
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然而终于没有
印出，不知所往了……。

《三闲集·在钟楼上》（一九二七年
十二月）

在广州，我觉得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这是当
革命的进行和胜利中，一定要有的现象。沪宁的克复，在看
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这“别人
出力我高兴”的报应之一，是搜索枯肠，硬做文章的苦差使。
其实，我于做这等事，是不大合宜的，因为动起笔来，总是离
题有千里之远。即如现在，何尝不想写得切题一些呢，然而还
是胡思乱想，象样点的好意思总象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
忽然想到昨天在黄埔看见的几个来投学生军的青年，才知道

在前线上拚命的原来是这样的人，自己在课堂上胡说了几句便骗得听众拍手，真是应该羞愧。忽而想到十六年前也曾克复过南京，还给捐躯的战士立了一块碑，民国二年后，便被张勋毁掉了，今年顷又可以重立。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环日报》上所载李守常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

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

当盛大的庆典的一这天，我敢以这些杂乱无章的话献给在广州的革命民众，我深望不至于因这几句出轨的话而扫兴，因为将来可以补救的日子还很多。倘使因此扫兴了，那

就是革命精神已经浮滑的证据。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

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倘若是的话，就应该在北京，厦门奋斗；但我躲到“革命后方”的广州来了，这就是并非“战士”的证据。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没有法子，姑且由它去罢。然而苦矣！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个不亦乐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说，因为它有指定的时候，不听拖延。临时到来一班青年，连劝带逼，将你绑了出去。而所说的话是大概有一定的题目的。命题作文，我最不擅长。否则，我在清朝不早进了秀才了么？然而不得已，也只好起承转合，上台去说几句。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钟为限。可是心里还是不舒服，事前事后，我常常对熟人叹息说：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了。

《而已集·通信》（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

本年一月间我曾去过一回香港，因为跌伤的脚还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闲走，演说一了，匆匆便归。……

我去讲演的时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约很受了许多困难，但我都不大清楚。单知道先是颇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卷，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经交涉的结果，是削去和改革了许多。

然而我的讲演，真是“老生常谈”，而且还是七八年前的“常谈”。

从广州往香港时，在船上还亲自遇见一桩笑话。有一个船员，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给我十分担心。他以为我的赴港，说不定会遭谋害；我遥遥地跑到广东来教书，而无端横死，他——广东人之一——也觉得抱歉。于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计画，禁止上陆时如何脱身，到埠捕拿时如何避免。到埠后，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还不放心，临别时再三叮嘱，说倘有危险，可以避到什么地方去。

我虽然觉得可笑，但我从真心里十分感谢他的好心，记得他的认真的脸相。

三天之后，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过因为攻击国粹，得罪了若干人。现在回想起来，象我们似的人，大危险是大概没有的。不过香港总是一个畏途。

《而已集·略谈香港》（一九二七年
七月十一日）

5.

现在，四近没有炮火，没有鞭笞，没有压制，于是也就没有反抗，没有革命。所有的多是曾经革命，将要革命，或向往革命的青年，将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

但这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

否则，革命的后方便成为懒人享福的地方。

.....

结束的祝词是：我先只希望中山大学中人虽然坐着工作而永远记得前线。

《集外集拾遗·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

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虽然留在后方的是呻吟，但也有一部分人们高兴。后方的呻吟与高兴固然大不相同，然而无裨于事是一样的。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一九二

七年四月十日）

我在厦门时，很受几个“现代”派的人排挤，我离开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但我为从北京请去的教员留面子，秘而不说。不料其中之一，终于在那里也站不住，已经钻到此地来做教授。此辈的阴险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不久还是排挤，营私。我在此的教务，功课，已经够多的了，那可以再加上防暗箭，淘闲气。所以我决计于二三日内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中大。

此后何往，还未定；或者仍暂留此地，改定《小约翰》，俟暑假后再说。因为此刻（开学已久）已无处可以教书，我也想暂时不教书，休息一时再说，这一年来，实在忙得太苦了。来信可寄“广州芳草街四十四号二楼北新书屋”（非局

字)收转。书籍亦径寄“北新书屋”收。这是一间小楼，卖未名社和北新局出版品的地方。

《莽原》第五六期各十本及给我之各二本，今天收到了。广东没有文艺书出版，所以外来之品，销场还好。《象牙之塔》卖完了，连样本都买了去。

《致李霁野》（一九二七年四月
二十日）

但还是因为行文不慎，饭碗敲破了，并且非走不可了，所以不待“无烟火药”来轰，便辗转跑到了“革命策源地”。住了两月，我就骇然，原来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于是接着是“清党”，详细的事实，报章上是不大见的，只有些风闻。我正有些神经过敏，于是觉得正象是“聚而歼旂”，很不免哀痛。虽然明知道这是“浅薄的人道主义”，不时髦已经有两三年了，但因为小资产阶级根性未除，于心总是戚戚。那时我就想到我恐怕也是安排筵宴的一个人，就在答有恒先生的信中，表白了几句。

《三闲集·通信》（一九二八年
四月十日）

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新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我住在上月租定的屋里，想整理一点译稿，大约暂时不能离开这里。前几天也颇有流言，正如去年夏天我

在北京一样。哈哈，真是天下老鸦一般黑哉！

《致孙伏园》（一九二七年四月
二十六日）

现在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

.....

广东也没有什么事，先前戒严，常听到捕人等事。现在似乎戒严了，我不大出门，所以不如其详。

《致章廷谦》（一九二七年五月
十五日）

这里现亦大讨其赤，中大学生被捕者有四十余人，别处我不知道，报上亦不大记载。其实这里本来一点不赤，商人之势力颇大，或者远在北京之上。被捕者盖大抵想赤之人而已。

《致李霁野》（一九二七年四月
二十日）

现在还记得《做什么》出版后，曾经送给我五本。我觉得这团体是共产青年主持的，因为其中有“坚如”，“三石”等署名，该是毕磊，通信处也是他。他还曾将十来本《少年先锋》送给我，而这刊物里面则分明是共产青年所作的东西。果然，毕磊君大约确是共产党，于四月十八日从中山大学被捕。据我的推测，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这看去很是瘦小精干的湖南的青年。

《三闲集·怎么写》（一九二七年
十月）

我这楼外却不同：满天炎热的阳光，时而如绳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艇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也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然而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沉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只是不见“火云”，时窘阴雨，若明若昧，又象整理这译稿的时候了。……

……加以虽然沉默的都市，而时有侦察的眼光，或扮演的函件，或京式的流言，来扰耳目，因此执笔又时时流于草率。……

《小约翰·引言》（一九二七年五月
三十日）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就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广州的天气热的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朝花夕拾·小引》（一九二七年
五月一日）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野草·题辞》（一九二七年四月
二十六日）

但讲讲元朝，不但为“政府”的“X司”所不悦，且亦为有些“同胞”所不欢。我早知道不稳当，总要受些报应的。果然，我因为谨避“学者”，搬出中山大学之后，那边的《工商报》上登出来了，说是因为“清党”，已经逃走。后来，则在《循环日报》上，以讲文学为名，提起我的事，说我原是“《晨报副刊》特约撰述员”，现在则“到了汉口”。我知道这种宣传有点危险，意在说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现是共产党的同道，虽不至于“枪终路衰”，益处大概总不会有